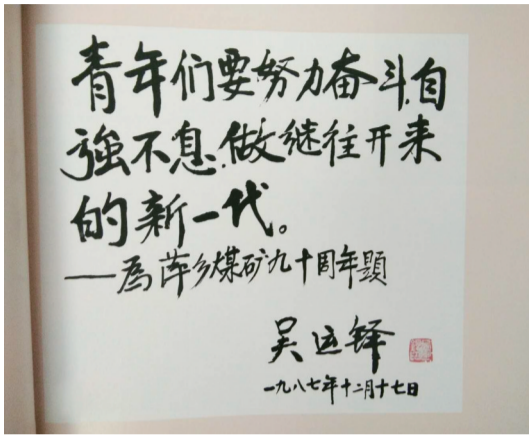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吴运铎：钢铁是这样炼成的

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一部风靡全国的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，出版10年间就陆续印刷了1000多万册。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和主人公，就是被誉为“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”的兵工功臣——吴运铎。

1917年，吴运铎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煤矿职员家庭。在机器轰鸣声中长大的他，从小就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工人，造机器、开机器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父母所在煤矿陷入半停顿状态，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也被迫关闭。吴运铎一家人失业又失学，生活陷入绝境。为了谋生，14岁的吴运铎便下煤矿做苦工，后来又辗转做过电工、钳工、铸工、水泥工，步步艰辛，境况却没有半点好转。

全国抗战爆发后，吴运铎在《新华日报》的影响

下，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1938年，他离开武汉，远赴皖南云岭，参加了新四军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从皖南云岭开始，吴运铎便投入到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人民兵工事业中，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、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、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、株洲兵工厂厂长、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，主持了多项兵器科研项目，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，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抗战时期，由于敌人的封锁，根据地的兵工生产困难重重。土筑的锻铁炉、木头做的风箱……整个兵工厂找不到一部像样的机器。吴运铎和同志们想方设法，因陋就简，从没爆炸的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中挖火药做原料，用民兵破路挖来的铁轨、道钉改造车

间里的钢凿、旋刀、钢模，用长凳、木桩、木板、石磨造出了旋床、打光机、发动机等土机器，扩大了枪弹生产规模。

面对敌人的“扫荡”，兵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要抬着机器打游击，在战斗间隙马不停蹄地开展生产，供应前线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只读过5年小学的吴运铎还是啃下了《经验设计》《机械原理》等书，设计出一张又一张机床图纸，和战友们一起建立了子弹厂，成功研制出拉雷、电发踏雷等多种武器弹药，为提高部队火力作出更大贡献。

生产研制武器弹药的危险性有目共睹。吴运铎在工作和战斗中曾多次负伤，失去了左眼，左手、右腿致残，经历手术20余次，但身上仍留有几十块弹片。面对危险与伤痛，吴运铎坦然无畏，以顽强的毅力一次又一次战胜病魔，回到生产一线。他说：“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、许多痛苦，但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。”

1951年10月，吴运铎被授予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。在同志们的要求下，他把自己的经历和事迹写成了长篇文章《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》，并在《工人日报》上连载，后来以《把一切献给党》为名出版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，在国外广泛传播。

离休后，吴运铎依然心系党的事业，参与了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、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的有关工作，为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。

1991年5月2日，吴运铎在北京病逝。他用一生，践行了自己“把一切献给党”的诺言。

■ 翟佳琪 据《学习时报》

徐特立断指血书激励学生



力的斗争。

1909年12月8日，徐特立以校董兼教员身份在长沙修业学校向全校师生作时事报告。他痛陈教案实情：“现在的满清政府，极是软弱无能，害怕洋人，巴结洋人，采用的政策完全是惧外媚外。而帝国主义凶恶之焰，一天甚似一天。老百姓不堪忍受，被迫起来反抗，以至酿成教案。但不管在哪里发生教案，吃亏的却总是我们中国人民。因为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，反而处处为洋人张目，为虎作伥。”他还勉励学生：“要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。义之所在，虽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，要向帝国主义报仇雪耻。”

讲到激动之处，悲愤之情难以自已，徐特立和学生都痛哭起来。忽然，徐特立从台上跳下，跑到厨房，拿出一把菜刀，当场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，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8个大字，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，激励青年学生反帝爱国。

在徐特立的带动和影响下，一大批青年学生先后走上救国救民之路。这一时期，徐特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，创办学校、培养人才，尽心尽力教育青年一代，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国家命运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徐特立还同青年学生一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，在异国他乡苦学救国本领。

■ 叶松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温和宽厚、慈眉善目的长者，很少有人知道他义愤填膺、挥刀断指的壮举。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中还特意写到徐特立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——“诚意割去的小指尖”。

徐特立断指血书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。甲午战争以后，许多不法的外国传教士嚣张跋扈，为非作歹，一些中国教徒也仗势欺人、鱼肉同胞。民众遇到不法侵害时，常常有理难说、有冤难申，甚至因此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情绪日益高涨，全国各地也不断上演中国人民同外国教会侵略势

启功题写校训

1997年，为纪念建校95周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决定面向全校师生公开征集校训。校领导发现1993年启功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书写的题词“师垂典则，范示群伦”，认为这8个字既寓意深刻，又贴近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，建议作为校训。

启功却觉得这8个字一来嫌显艰深、不够通俗，二来稍感平板、过于静态训释，作为校训不很合适。几天后，启功又向学校提交了数种校训方案。经过反复研究，最终将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确定为校训。

校训一经公布，立即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认同。这8个字不仅更加平易通俗，而且更加深刻蕴藉。它不仅紧扣“师范”特色，而且蕴含了学与行、理论与实践、做学问与做人、做一般人和做教师之间的辩证关系。随后，学校领导敦请启功赐墨勒碑，启功欣然应命。但他特别强调：“校训之撰，当属学校。校训碑正面右首当署‘北京师范大学校训’。落款则是启功‘敬’书，表明在校训面前，启功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。”

后来，学校有关部门多次请启功阐释所题校训的意义，启功每次都以“学习校训，理解如此”的口吻来写，从不把校训当作自己的创造而专有。一次，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，启功总结了他对校训的理解：“所学，足为后辈之师；所行，应为后人之范。”他进一步解释，“学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知识、技能以及技能，仅仅‘具有’还不够，要达到一定的程度，是要能够成为后学的师表；行，是指每位师生应有的品行，这包括思想、行为、待人、对己，方方面面，时时刻刻，都光明正大，能够成为世界上、社会中的模范。这种模范，不是等待旁人选举出来，而是自己随时扪心自问，有没有可惭愧的思想行为。校训没有任何人执行考试、考察、判分、评选，但是每位师生，都生活在自己前后左右无数人的雪亮公平的眼睛中。”

启功一生以书法大家、诗词大家、文物鉴定大家和著名学者等多种名衔闻名于世，但他最看重的却是教师的身份。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这8个字，既是启功一生从教的实践经验总结，也是他一生70余年教师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■ 夏明亮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